

評介 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陳 俊 華

書名：John L.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Taipei reprinted, 虹橋書店, 民國 61 年, original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318pp.

著者：John L. Rawlinson (曾任長島 Hoffstra 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前人對此書評介的回顧

清季的自強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大事，海軍的現代化更是其中關係國家存亡的政策。三十多年以前，專門有系統、有理論來探討新建海軍問題的作者，並不多見，美國的 Rawlinson 能於 1966 年完成有關這方面研究的一部著作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確實難得。

此書在出版後不久即有數篇評介，分別刊登在如下的期刊上：

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7, no.1 (Nov., 1967), pp.139-140, David Pong & Jack Gerson's review.
2.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3, no.2 (Dec., 1967), pp.563-564, Knight Biggerstaff's review.
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一期 (民國 58 年 8 月), pp.377-381, 王家儉教授的書評。

綜觀三位前人的書評，各有重點所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 David Pong

之評論貶多於褒，結語竟謂 Rawlinson 一書並未稱得上有學術水準；但 Biggerstaff 則把此書譽為權威之作。前者批評作者蒐集的資料不足，例如沒有參考《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陳恭祿的〈曾國藩與海軍〉，和〈洋務運動〉兩篇文章，作者對人對事的批評亦妄加臆測；後者則稱揚作者所採用的中文原始資料及轉手資料極為齊備，並以嚴謹的態度寫作。這兩篇的書評竟有相反的意見，真教人納悶。倒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王家儉教授對此書的評介頗為中肯。王教授指出作者遺漏了不少中文方面的原始資料，例如曾紀澤的文牘奏議、《清實錄》、《光緒朝東華續錄》等及一些時人記述皆未見參閱，而且在述事方面亦有幾處錯誤的地方，例如沈葆楨於光緒元年六月奏請的南北洋海軍費用，事實上有所撥發，但作者卻說此奏請未獲批准。不過王教授對該書仍存肯定態度，並指出作者的結論已跳出傳統認為新建海軍是由於經費不足而招致失敗之說法，作者強調中國人的文化觀念及傳統的制度是清末海軍現代化的根本障礙。事隔三十年，而今筆者對該書作出評介，乃希望能補充前人作評論時或許忽略之處，讓讀者能夠更深入了解該書。

二、內容簡介

首先簡介全書的內容和主旨。全書的本文共分十章，基本上，作者以某一時期所發生的事件作為一章的主要內容。各章目如下：

1. 傳統的中國水師及其在鴉片戰爭的失利
2. 中國對西方海軍挑戰的遲疑反應
3. 1875 年以前的軍事自強運動
4. 1875 年至 1885 年間李鴻章與海軍的發展
5. 1875 年至 1884 年間軍事建設努力的成就與困難
6. 南方的災難：中法戰爭期間（1884 至 85 年）的中國海軍
7. 1885 年之後的海軍發展：北洋艦隊的出現
8. 1885 年至 1894 年間的海軍訓練
9. 北方的災難：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的海軍情況
10. 結論

作者先從鴉片戰敗而論到中國儒家思想不能應付新挑戰的情況，並謂中國傳統的結構是阻礙海軍現代化的主因、作者又比較鴉片戰爭時中英海軍的實力，當時中國雖有水師，但仍以陸戰為主，並指出中國的水師權未歸中央，而是分隸於四大區管理：即兩廣、閩浙、兩江和直隸，指揮權分散，人事結構凌亂，水師官兵或出身科舉，不過大部份來自招降之士，或海盜流賊之徒，可說是全無現代化的海軍知識。

作者繼而在第二章裡分析中國對西方挑戰的遲疑反應的原因，並強調鴉片戰敗後仍未使大部份的官員有傾向海軍發展的想法、再加上曾國藩在陸戰上大敗太平天國的軍隊，更加深他們對陸戰的依賴，認為只要加強幾座沿岸砲台和堡壘，便可以阻止洋人海軍的入侵，連當時頗有新思想的魏源也在他的《海國圖志》裡強調防海不如防港口，防港口不如防內陸河川的觀念，(p.28) 仍然停留在內河水師作戰的構想階段。直到英法聯軍戰敗中國後，清廷才慢慢感覺到海軍現代化的重要性，遂有阿思本 (Sherard Osborn) 兵艦購買案，向英國購買八艘戰船。但因阿思本和總稅務司李泰國 (Horatio Nelson Lay) 向清廷要求過份，並無形中使清廷的海軍指揮權由外國人控制，清廷不悅，此購兵艦案最後被取消了，但此時左宗棠已主張自建船廠，製造戰船，選定的地點就在福建的福州。

第三章主要論述左宗棠發起，後由沈葆楨出掌大局的福州船政的經過與發展，外購船隻、仿洋自製和設立船政學堂訓練海軍人才的情況，亦簡述江南製造局的貢獻。作者更指出福州船政所遇到的種種困難，例如經費問題，人事凌亂，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省皆不熱衷支持；更有人從中作梗，例如內閣學士宋晉與閩浙總督吳棠皆反對船政，認為耗費而無功。但朝中支持船政的仍有不少重臣，例如恭親王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何璟等。本章又論述船政學堂聘法人日意格 (Prosper Giquel) 和德克碑 (Neveve d'Aiguebelle) 主持訓練海軍各類學員的情況。到了 1874 年日本侵略琉球後，才刺激清廷較重視海軍的建設。

作者在第四章專論李鴻章於 1875 年至 1885 年間與海軍發展的關係，換句話說，主要論述北洋艦隊、天津水師學堂和李鴻章的關係。作者認為李鴻章意在以北洋海軍作為自己的嫡系部隊，取代福州船政的成就。更謂李鴻章是一

名政客、機會主義者，不信任英法的海軍顧問，反而受德國人天津稅務司德璵琳 (Detring) 的影響，屬意德國幫助清廷發展現代化的海軍，包括聘請德顧問建造船塢，並著令駐外大使李鳳苞全權負責採購洋艦的一切事宜（後來李鳳苞因營私舞弊而丟官，李鳳苞是李鴻章的親信）。作者又認為李鴻章並不認定海軍是防衛中國的最主要力量，(P.76) 但作者仍指出雖然李鴻章與沈葆楨不和，但二人皆同意選派船政學堂的畢業生，分批到英法兩國學習海軍、海事的現代化知識和登艦實習。放洋的學員由日意格領隊，李鳳苞監督之。第一期出國的學員即包括劉步蟾、嚴復和林泰曾等福州船政學堂的第一期畢業生。

第五章分析在發展現代化海軍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例如中央不太支持地方的建設，各督撫間的劃地自限，不相配合，勾心鬥角，主事者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楨等也常游移於外購或自造戰船的政策中，由於有經費、人事、政事等各種問題，船政難以辦好。

作者在第六章裡主要是透過中法海戰來指出南北洋兩大派系的不和，及中國海軍仍未有應付西方戰艦來侵的能力；又進一步指出中法海戰，中國戰敗的主因在遲疑不決未能迅速備戰，而北洋艦隊也沒有派出支援之故。加上當時的南洋艦隊無論在戰略上、人事指揮權上、官兵的作戰能力上和紀律上，皆未夠水準，當然戰敗。作者引北洋海軍美籍教官 L.C. Arlington 所見的李鴻章海軍紀律為證：例如閒雜的老百姓隨時可以登艦遊玩，哨兵竟沉沉大睡，其他的紀律更不用說了。(P.126)

第七章說明北洋海軍的成立及李鴻章指示訂定的海軍章程與課程，並論述自中法海戰後，清廷對海軍的建設又有一個新的認知，即海軍中央化，因而有海軍衙門的設立。作者指出由於海軍衙門歸內務府管理，所以此部門沒有多大用處，形同虛設；而海軍權始終未能回歸中央：仍操在地方督撫手上。

本章更論述海軍費用部份被挪作慈禧建頤和園之用，影響海軍建設至鉅。李鴻章於 1894 年的奏摺中聲稱，自 1888 年後到甲午戰爭時，海軍沒有增加過一隻新船。(P.144) 作者更謂在甲午戰爭前一年，只有外國人，例如在李鴻章旗艦上服務，亦是甲午戰爭時與劉步蟾在「定遠號」共同指揮作戰的英人泰樂爾 (William F. Tayler) 敢對北洋艦隊提出真正的批評；泰樂爾指出當時官員任用私人和貪污腐敗的情形。(pp.135-136) 其他中國官員沒有一個人敢說

北洋艦隊徒負虛名。此時李鴻章不知道受誰人的影響，竟傾向於購買小船的政策，他向曾紀澤建議購買或自造非裝甲而吃水淺、可以配備魚雷、時速達十七海浬的小船，作為海軍的主力。

第八章專論海軍的訓練問題，但側重在北洋艦隊的訓練上。分析 1888 年李鴻章批准的海軍章程所規定的課程與學員學習的情況，主要由英人琅威理 (William M. Lang) 負責訓練，最後論及華洋兵將不睦，導致琅威理被排斥，終因升旗事件感到不快而憤然辭職後，影響中國海軍訓練至鉅的情況。此後中國的海軍紀律也開始散漫，作戰能力也大為退步；英國方面也因此事件，而拒絕中國的放洋海軍學員上英艦實際操作；此外，海軍內部南北兵員又對立不和，例如以陸軍出身的丁汝昌出任海軍提督，由於不曉海事，丁氏便被船政學堂的官兵鄙視，不能上下一心。

第九章是敘述中日甲午戰爭的情況，包括前因後果及戰爭的經過。作者指出李鴻章的北洋艦隊是大雜燴，指揮號令不一，提督丁汝昌又不懂海戰，無論在戰陣和戰略上都顯得凌亂，戰船的速度和武器的裝備也不如日本。本章特別討論在「濟遠號」的方伯謙臨陣逃脫返回旅順港，而事後被判斬首之事有待商榷。此外，作者又引當時美國人的目睹，謂閩籍官兵大都貪生怕死，其他人則奮勇作戰。

作者在結論裡總結以上九章所述的，並提出幾個有關中國海軍現代化最後失敗的原因：即儒家思想的阻礙、君權的衰弱、中央與地方脫節、地方勢力坐大、各省明爭暗鬥、主事者各有懷抱，也沒有統一的全盤計劃，更遑論現代化的營運知識了：例如設立獨立的海軍部，訂立海軍法，編列預算等；尤其是海軍預算沒有專人負責，只是交給地方政府自行籌募，致使建設海軍的經費左支右絀，財源短缺。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官場上做官不做事，任用私人，貪污舞弊，對人不對事的風氣，更使官員在建設新式海軍的過程中，遇事推諉，馬虎應付。作者更明白指出新式海軍的建設仍歸失敗，實在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人事、政治、制度和官員的認知觀念不清楚所致。

三、評 介

整體而言，本書的內容頗為充實，讀者透過各章可以得知清季海軍現代化的發展情況，並了解其中各種複雜情形和困難所在。筆者認為本書最值得稱道之處是，作者提出了當時頗新穎的觀念和解釋：即清季海軍的發展是艱苦的，更要依賴外國人的幫助，例如出售艦艇給中國，並代為訓練海軍人才和造船工程師。作者認為新式海軍的建設成功與否並不單單繫於經費的不足，而賴於中國傳統官場文化的突破和官員們觀念的改變，能夠接受一種新文化的挑戰，才可以成功。作者指出船堅砲利的新式海軍不僅僅是一種實用技術，它更是一種新的文化觀念，若沒有新觀念作為指導的核心，則新式海軍的建立終會失敗，而事實上則已由中日甲午戰爭證明之，這是全書的主旨。

除了結論新穎之外，本書的四個附錄——A. 中國陸海軍戰團組織表、B. 中國陸海軍官階表、C. 兵船名稱表和D. 人名表，都相當有參考價值，而兵船名稱表皆記錄自1860年至1895年以來無論是外購或自造的船隻名稱，並大都附有該船的簡介；此外更有甲午戰爭時日本戰船的名稱，對於中日雙方海軍實力的比較，一目了然。人名表則把與發展海軍有關係的人物統統記下，並且儘量附載簡介。書末的字彙以中英對照出現，大都是專有名詞，例如三海、後路等，惜未加解釋，殊為美中不足；但最後幾頁的索引卻方便讀者不少，使人容易翻查所需資料，全書所載的附錄、註釋、參考書目、字彙和索引等共計114頁。

不過，除了優點之外，本書的缺失也不少。首先是寫作技巧上，本書雖然共分十章，但實在只有九章，因為第十章是結論，若再細分下去，則與題目有關的只有七章，因為第六章和第九章分別主要討論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共計50頁，約佔全書正文204頁約五分之一，這兩章在份量的安排上稍嫌過多。

此外，作者並非以時間為綱來討論海軍的發展及其內部問題，而是以某時期發生了某些事件來作一章的單元，編定章次加以討論，因而事多重述，且有時序倒述的情況，讀者不易理清頭緒，例如在第三章第56頁至59頁裡，作

者論述學員在福州船政學堂受日意格訓練、上課及學習駕駛等情況，應該接在第 49 頁談學制要求的那一段之後，而不該放在第 56 頁及其後的幾頁裡，因為在 56 頁之前，已述及受聘負責訓練學員的日意格任期已滿，不再主持訓練了。又如專就李鴻章與海軍的關係而寫成的第四章，有不少內容在第五章內重覆出現。筆者認為較妥當的安排，是把第四章併入第七章——北洋艦隊的出現內，而把第五章併入第三章論述福州船政之內，作為續文。

本書各章只有章目，沒有節目，使讀者不易把握重點，更使人讀來有冗長囉嗦之感、雖然作者採用的資料不少，但有些主要的中文原始資料例如《曾文正公文集》、沈葆楨的《沈文肅公政書》等未見徵引，實在是一大缺失；而一些無關本書宏旨的卻被參用，例如 W. C. Hunter 的 *The Fan Kwan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 1825-1844*。倒是使人覺得奇怪。

此外，作者對事或對人物的批評亦頗為武斷，例如在第八章內聲稱，曾國藩欲把阿思本 8 艘兵船購買回來作為自己湘軍的部隊，(P.35) 作者只是看到曾國藩有意安排湘軍到該等艦隻上服務，便認定曾氏假公濟私，培養私人軍力，這種說法證據不足。作者又在第四章謂李鴻章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也同樣有欠公允；至於指沈葆楨任用私人，更是臆測之言，因為福州船政學堂的學生不盡是閩籍人士。在同一章內，作者又指稱福州船政當局不太支持李鴻章的北洋艦隊，(P.8) 也是錯誤的評論。事實上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學堂的總教習，就是福州船政學堂早期畢業的學員嚴復，而日後在北洋艦隊服役的指揮官和兵員，很多都是由福州船廠派出來的。

至於附錄 D. 人名表內寫錯名字的不少，例如連沈葆楨也誤寫為沈葆楨，呂翰誤作呂瀚；其他更有把人的名和字分別當作為兩個人，就這方面的勘正，王家儉教授的書評列有人名正誤表，可供參考。

綜觀全書，寫作技巧不算高明，文筆也不流暢，由於夾敘夾議，各章討論之事，常有重覆。不過，作者對整個清季新式海軍創設與發展的來龍去脈，大致上都能和盤托出，且在論述到當時，分析個中原委，並把其中複雜的情況、各派系甚至外國（例如英、法、德）之間勾心鬥角，為了爭取中國這個買主，而欲影響中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等心態也剖析出來。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是

作者的結論，他對清季新式海軍的發展及其失敗提出了新的解釋，作者指出此乃中國人的觀念問題，無論讀者同意與否，作者在全書各章中，顯然為他這個結論作闡述，雖然本書有上述一些缺失，但時至今日仍值得一讀。

（本文作者為輔英技術學院講師）